



民商事诉讼实务前沿

2025年5月刊

上海市律师协会
民商事诉讼业务研究委员会
编委会

王正 关峰 彭筱剑 施磊
承当 罗莺 陆懿颖 黄阅月
薛炜 赵秦 范晓峰 于云帆
姜胜 刘英明 邵嘉奇 吴俚君
王曦明 刘晓明 邱艳平 王储

目 录

• 新规速递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3
- 最高法相关部门负责人就政府信息公开司法解释答记者问.....9

• 业务动态

- 民法典颁布五周年典型案例——“严格公正司法，服务和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专题.....12
- 民法典颁布五周年典型案例——“传承中华美德，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专题 20

• 实务研究

- 徐芬：业主知情权部分法律问题解析 | 衡石·观点.....26
- 审理互联网案件的4种思维3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时间：2025年5月19日；

信息网络原址：<https://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465541.html>

法释〔2025〕8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为正确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行政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下列涉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 （一）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告知政府信息无法提供或者不予处理的；
- （二）行政复议机关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不予公开行为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
- （三）认为行政机关提供的政府信息不符合其申请内容的；
- （四）认为行政机关主动公开或者依他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侵犯其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合法权益的；
- （五）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其他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第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职责，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告知其先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政府信息。

对行政机关的答复、逾期不予答复等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条 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不予公开等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四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主动公开政府信息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公开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为被告。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作出答复的行政机关为被告；逾期未作答复的，以收到申请的行政机关为被告。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日常工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机构以自己名义所作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该机构为被告。

第五条 被告对其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不予公开等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一）被告主张政府信息已经公开的，应当就公开的事实举证，并向人民法院提交其已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方式、途径等证据；

（二）被告主张因公共利益决定公开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的，应当就认定公共利益的理由以及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举证；

（三）被告主张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内部事务信息不予公开的，应当就该信息属于人事管理、后勤管理或者内部工作流程信息等举证；

（四）被告主张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的，应当就该信息系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之前形成的内部讨论记录、过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等举证；

(五) 被告主张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行政执法案卷信息不予公开的, 应当就该信息系行政执法过程中形成并记录于执法案卷的当事人信息、调查笔录、询问笔录等举证;

(六) 被告主张政府信息不存在的, 应当就其已尽合理检索义务等事实举证或者作出合理说明。

第六条 被告主张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系国家秘密不予公开, 并提供密级标识、保密期限或者其他证明材料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被告主张原告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稳定, 并提供该信息公开后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证据或者作出合理说明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政府信息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稳定的, 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

第七条 原告应当就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

- (一) 起诉要求被告公开政府信息的, 应当就其曾向行政机关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举证;
- (二) 起诉要求被告不得公开政府信息的, 应当就政府信息涉及其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举证;
- (三) 就行政机关公开或者不予公开等行为可能损害其合法权益举证。

第八条 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政府信息公开案件, 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人民法院审理政府信息公开案件, 应当视情采取适当的审理方式, 避免泄露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中要求应当保密的政府信息。

第九条 政府信息由被告的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保管的, 适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

涉及政府信息公开事项的档案已经移交各级国家档案馆的, 依照有关档案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涉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明显不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不予登记立案。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裁定驳回起诉：

- （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而未申请的；
- （二）行政机关作出延长答复期限或者要求申请人补正等程序性告知行为的；
- （三）单独起诉行政机关收取信息处理费决定的；
- （四）申请人重复申请公开已经予以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作出不予重复处理答复的；
- （五）申请行政机关公开的信息属于工商、不动产登记等资料，行政机关告知其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查询的；
- （六）要求行政机关为其制作、加工、分析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未予提供的；
- （七）申请人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形式进行信访、投诉、举报等活动的；
- （八）要求行政机关提供政府公报、报刊、书籍等公开出版物的；
- （九）认为公共企事业单位未公开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的；
- （十）其他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情形。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

- （一）被告对依法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拒绝或者部分拒绝公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被诉不予公开决定，并判决被告在二十个工作日内公开；
- （二）被告对原告要求公开的申请无正当理由逾期不予答复，原告请求判决被告公开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在二十个工作日内公开；

（三）被告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能够作区分处理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在二十个工作日内公开能够公开的内容；

（四）被告以政府信息公开会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为由不予公开，但第三方在诉讼程序中同意公开且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可以公开的，判决被告在二十个工作日内公开。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

（一）被告公开政府信息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二）被告在诉讼程序中公开政府信息，原告仍然要求确认原不予公开或者逾期不予答复行为违法的；

（三）被告不予公开或者不予答复行为违法，但判决公开没有意义的。

第十三条 政府信息尚未公开前，原告起诉要求被告不得公开政府信息的，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政府信息涉及原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且不存在不公开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判决被告不得公开政府信息。

诉讼期间，原告申请停止公开涉及其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裁定暂时停止公开。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被告作出的公开、不予公开的决定或者无法提供、不予处理的告知合法的；

（二）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已经向公众公开，被告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途径和时间的；

（三）被告收到同一申请人的不同申请或者不同申请人内容相同的申请后，在同一个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中一并予以答复且答复内容合法的；

（四）原告起诉被告逾期不予答复理由不成立的；

（五）原告以政府信息侵犯其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为由请求不公开，理由不成立的；

(六) 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

第十五条 本解释自2025年6月1日起施行。

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1〕17号）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不再适用。

最高法相关部门负责人就政府信息公开司法解释答记者问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时间：2025年5月19日；

信息网络原址：<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65531.html>

2025年5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建，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三级高级法官李小梅出席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副局长姬忠彪主持。

问题一：我们关注到《解释》第十一条对判决行政机关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请问有何考虑？

答：第十一条是关于判决给付的规定。在《解释》制定修改过程中，我们从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属于给付诉讼、要实质性回应和支持当事人依法获取政府信息诉求出发，作出本条规定。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因此，经过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政府信息依法属于应当公开的范畴，则判决二十个工作日内将政府信息给付给原告。本条第一、第二和第三项区分了被告拒绝或者部分拒绝公开、被告无正当理由逾期不予答复以及政府信息内容可以作区分处理这三种情形分别进行规定。我们认为，经过人民法院审理，原告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属于依法应当公开的，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二十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这样可以更加有效地保障原告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进一步做实定分止争。

问题二：《解释》第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应当视情采取适当的审理方式。请进一步解释如何理解适当的审理方式？

答：《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应当视情采取适当的审理方式，以避免泄露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中要求应当保密的政府信息。“视情采取适当的审理方式”是指按照案件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审理方式。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审理方式包括公开审理和不公开审理两种。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行政案件，但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虽然没有规定商业秘密，但是商业秘密的保护在其他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促进法》中均有规定。不公开审理并非指人民法院采取书面审理的方式，而是开庭审理但是不对案外人公开的方式，即不允许其他人员旁听，也不允许采访报道等。此外要强调的是，不公开审理仅是审理过程的不公开，对于审理的结果仍然应当公开。

问题三：我们看到被告举证责任方面有两个条文予以规定，请问是如何考虑的？

答：在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首先要遵循的还是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由被告对行政行为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的基本原则。我们在《解释》第五条中针对被告提出的不同主张，其应承担的举证责任分别进行规定。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这类案件审理过程中，要格外注意对可能涉及国家秘密等政府信息的安全保护。在审理涉及国家秘密的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过程中，审判人员难免会接触到涉密信息，而且这些涉密信息本身就是审查对象。在司法实践中，一定要严格注意审判人员有无因审理工作需要获悉秘密信息的权限和必要，以及审理方式和证据规则是否能够满足保密的需要。我们认为，在审理过程中，被告能够证明其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被确定为国家秘密，或者能够提供有关主管部门、保密工作部门等出具的其他证明材料的，人民法院应予认可。此外，为了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需要，被告已提供相应证据或者进行充分说明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对于当事人举证不积极，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政府信息公开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稳定的，还要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

问题四：在政府信息公开实践中，绝大部分当事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信息，但我们也了解到有极个别当事人存在滥用权利的情况。对此《解释》有什么举措？

答：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目的，是为了更好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具有不设门槛、保持最大程度的便利性、开放性的特点。司法实践中的确存在有的当事人申请信息公开、提起行政诉讼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取信息，而是为了引起有关机关对其利益诉求的关注与重视；极个别当事人甚至多次重复申请公开相同、同类政府信息，继而形成大量明显超出正常权利保护需求的行政复议和诉讼案件。此类滥用权利行为，既挤占大量的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影响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正常履行职能，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程序与制度空转，损害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基于此，我们在《解释》的制定过程中，着眼于人民法院做实定分止争、推动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的本职本业，立足于当事人实体权益保护，从举证责任承担、简易程序适用、裁判方式明确等方面作出相应规定。

民法典颁布五周年典型案例——“严格公正司法，服务和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专题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时间：2025年5月27日；

信息网络原址：<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66131.html>

案例一：依法治理盲目“放生”，切实维护生物安全——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诉徐某、刘某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20年12月，徐某在未向主管部门报告的情况下，将从刘某处购买并由其运至现场的鲢鱼25000斤投放至江苏省常州市长荡湖。后其投放的湖面陆续出现大量死亡鲢鱼，至2021年2月，当地渔政部门累计打捞死亡鲢鱼20208斤。经鉴定，死亡鲢鱼为革胡子鲶，系具有极强适应能力、繁殖能力的外来物种，入侵成功将对本土鱼类资源和水域生态系统造成毁灭性打击。涉案投放行为对长荡湖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死亡腐烂的革胡子鲶对长荡湖水质造成的影响，二是未打捞上岸的革胡子鲶对本土鱼类及生物多样性损害。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徐某、刘某连带赔偿违法放生造成的长荡湖渔业资源直接损失、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损失、专家评估费用等。

【裁判结果】

生效裁判认为，徐某投放外来物种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存在主观故意，且投放革胡子鲶造成严重的生物安全风险，威胁国家生物安全，属于造成严重后果的生态破坏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刘某明知徐某购买革胡子鲶投放于天然开放水域，并根据徐某的要求将革胡子鲶运输至长荡湖投放现场，构成共同侵权，应对徐某违法投放造成的生态损害结果承担连带责任。故依法判决徐某承担生态资源损失3万元、服务功能损失5000元，用于长荡湖生态环境修复；事务性费用1.8万元等，用于长荡湖生物安全风险防范科普、法治宣传。刘某对上述费用承担连带责任。

【典型意义】

“加强生物安全管理，防治外来物种侵害”是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外来物种入侵是威胁国家生物多样性、生态安全和公众健康的重大安全问题。缺乏科学指导和法律监管的盲目“放生”行为会对本地的生态系统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并对生物安全带来巨大风险。本案系全国首例非法投放外来物种民事公益诉讼案，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相关规定，从行为性质、生态破坏后果、过错程度等角度依法认定被告的法律责任，对于引导社会公众更加重视盲目“放生”可能带来的生物安全风险，共同维护生态环境，守护绿色家园具有重要意义。

案例二：依法保障技术服务方合法权益，促进创新成果转化运用——天津某传热设备有限公司诉韩城市某热力有限公司能源管理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某传热设备公司系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开发了利用钢厂生产过程中的炼钢冲渣水余热供暖的新技术。某热力公司因经营需要，与某传热设备公司签订能源管理合同，约定由某传热设备公司向其安装炼钢冲渣水余热供暖的“渣水换热器”等设备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某热力公司于每个采暖季结束后按照合同约定向某传热设备公司支付一定的节能效益分享款。某热力公司在使用涉案换热器过程中，发现该设备因漏水与堵塞造成换热效果降低，进而影响正常供暖，便不再向某传热设备公司支付节能效益分享款，双方产生争议，遂某传热设备公司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生效裁判认为，某传热设备公司提供的涉案能源管理服务，是利用钢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热量为居民供暖，全国仅有包括某传热设备公司在内的少数几家公司能提供此项技术，该技术具有一定的环保效益以及创新性。科技型企业需要在技术创新、实践改造、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成长是基本规律，在处理因能源管理合同履行产生的纠纷时也要考虑该因素。某传热设备公司后期维修便利性方面虽存在欠妥之处，但并非故意提供质量不合格的产品，在诉讼期间某传热设备公司亦积极寻找故障原因。在综合考量上述因素下，判决某热力有限公司依约向某传热设备公司支付欠付的节能效益分享款及逾期付款利息，同时判决某传热设备有限公司赔偿某热力公司一定经济损失。

【典型意义】

大力推动节能工作，把节约资源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流程、各领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钢铁行业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气余热，将炼钢冲渣水余热等废水废气充分利用变废为宝，不仅能为企业节能降耗创造效益，而且还能满足城市供暖需要，也有利于改变城市热源单一、环境污染等问题。 本案中，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等规定，合理认定双方当事人的责任，依法保障技术服务方享有节能效益、分享合法权益，体现了对生态环境科技、绿色低碳技术等创新成果的司法保护，有利于促进成果转化运用，助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案例三：“严保护” “高判赔”，积极营造鼓励创新环境——吉某公司等诉威某公司等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

【基本案情】

吉某公司及关联公司（以下简称“吉某方”）近40名高级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先后离职赴威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以下简称“威某方”）工作，其中30人于2016年离职后即入职。2018年，吉某方发现威某方两公司以上述部分离职人员作为发明人或共同发明人，利用在原单位接触、掌握的新能源汽车底盘应用技术以及其中的12套底盘零部件图纸及数模承载的技术信息（以下简称“涉案技术秘密”）申请了12件专利，且威某方推出的威某EX系列型号电动汽车，涉嫌侵害涉案技术秘密。吉某方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威某方停止侵害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21亿元。

【裁判结果】

生效裁判认为，本案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地以不正当手段大规模挖取新能源汽车技术人才及技术资源引发的侵害技术秘密案件。通过整体分析和综合判断，威某方实施了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全部涉案技术秘密、以申请专利的方式非法披露部分涉案技术秘密、使用全部涉案技术秘密的行为。故判决：除非获得吉某方的同意，威某方应停止以任何方式披露、使用、允许他人使用涉案技术秘密，不得自己实施、许可他人实施、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涉案12件专利；将所有载有涉案技术秘密的图纸、数模及其他技术资料予以销毁或者移交吉某方；以发布公告、公司内部通知等方式，将判决及其中有关停止侵害的要求，通知威某方及其所有员工以及关联公司、相关部件供应商，并要求有关人员和单位签署保守商业秘密及不侵权承诺书等；考虑威某方具有明显侵权故意、侵权情节恶劣、侵害后果严重等因素，对威某方2019年5月至2022年第一季度的侵权获利适用2倍惩罚性赔偿，威某方应赔偿吉某方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约6.4亿元。同时明确，如威某方违反判决确定的停止侵害的义务，应逐项按日或者一次性支付迟延履行金。

【典型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本案中，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相关规定，在认定构成侵害技术秘密的基础上，在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同时，还对停止侵害民事责任的具体承担方式、非金钱给付义务迟延履行金的计付标准等进行积极探索，推动了知识产权审判理念更新和裁判规则创新，充分彰显了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鲜明态度和制裁不正当竞争的坚定立场，有利于营造诚信经营、公平竞争、激励创新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案例四：依法保护声音权益，促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殷某诉北京某智能科技公司等人格权侵权案

【基本案情】

原告殷某是一名配音师，发现他人利用其配音制作的作品在多个知名APP广泛流传。经溯源，上述作品中的声音来自于被告一北京某智能科技公司运营的平台中的文本转语音产品，用户通过输入文本、调整参数，可实现文本转化成语音的功能。原告曾接受被告二北京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委托录制录音制品，被告二为录音制品的著作权人。后被告二将原告为其录制的录音制品的音频提供给被告三某软件公司，允许被告三以商业或非商业的用途使用、复制、修改数据用于其产品及服务。被告三仅以原告录制的录音制品作为素材进行AI化处理，生成了涉案文本转语音产品并在被告四上海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云服务平台对外出售。被告一北京某智能科技公司与被告五北京某科技发展公司签订在线服务买卖合同，由被告五向被告三下单采购，其中包括了涉案文本转语音产品。被告一北京某智能科技公司采取应用程序接口形式，在未经技术处理的情况下，直接调取并生成文本转语音产品在其平台中使用。殷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一北京某智能科技公司、被告三某软件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赔礼道歉，五被告应当赔偿殷某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

【裁判结果】

生效裁判认为，声音权益是一项人格利益，关乎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处理后的声音，只要一般社会公众或者一定范围内的公众根据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能够识别出特定自然人，则该自然人声音权益可及于该AI声音。上述五被告均未经原告许可使用了原告声音，实施了侵害原告声音权益的行为，构成对原告声音权益的侵害。因案涉侵权产品已经下架，故不再判决五被告承担停止侵害的侵权责任，而是结合原告诉请、各被告的主观过错等因素依法判决被告一北京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三某软件公司向原告赔礼道歉，被告二北京某文化传媒公司、被告三某软件公司向原告赔偿损失。

【典型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在风险研判和防范，维护人民利益和国家安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声音伪造、模仿等行为日益普遍，由相关技术引发的侵害人格权纠纷也逐渐增多。我国以立法形式将“声音”保护写入民法典人格权编，体现了对自然人声音权益的尊重，以及对技术发展和社会需求的积极回应。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声音作为一种人格权益，具有人身专属性，未经权利人许可擅自使用或许可他人使用录音制品中的声音构成侵权，为新业态、新技术的应用划定了行为界限，有助于规范和引导人工智能技术沿着为民、向善的方向发展。

案例五：支持非公司制法人依法强制清算，助推“僵尸企业”及时出清——天河南街道办申请天河某公司强制清算案

【基本案情】

天河某公司成立于1993年，系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主要经营范围为批发业。2009年1月，天河某公司因不按规定年检被广州市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吊销营业执照。2020年12月，天河南街道办作为天河某公司的主管单位，以天河某公司在解散事由出现后未依法成立清算组为由，申请法院指定清算组对天河某公司进行强制清算。

【裁判结果】

生效裁定认为，依照民法典第七十条规定，法人的主管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天河某公司系集体所有制企业，应参照公司制法人的有关规定进行清算。该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未依法自行清算，天河南街道办作为主管机关，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对天河某公司进行强制清算，符合法律规定，予以受理。2021年1月，裁定受理天河南街道办提出的强制清算申请，并指定清算组对天河某公司进行清算。

【典型意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完善企业退出制度”。民法典赋予了主管机关对非公司制法人提出强制清算的主体资格，为破解非公司制法人无人申请、无法启动强制清算程序的僵局提供了明确依据。本案中，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七十条规定，支持非公司制法人进行强制清算，助推“僵尸企业”出清，保障债权人利益，切实发挥了强制清算制度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防范化解风险、优化营商环境中的重要作用。

案例六：经营主体人格权受法律保护，损害名誉应担责——某瓦罐煨汤店诉戴某名誉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戴某的丈夫在某瓦罐煨汤店购买了桂圆排骨汤、饺子各一份。随后，戴某以家人不适应该饮食为由，手提其丈夫购买的汤来店里要求退换。双方协商未果，戴某当即将手中的汤甩在地上，愤然离店。后戴某心有不甘，为制造影响，在某平台上将该瓦罐煨汤店的招牌拍照并发布视频，并配发侮辱性文字。视频发布后，立即引起围观，在围观者发文提问“怎么？”时，戴某以“人品太差了”予以回复。瓦罐煨汤店经营者得知此事后，要求戴某停止侵害，戴某当晚将该视频予以删除。因瓦罐煨汤店名誉权受到侵害，虽经双方协商沟通，但未达成一致意见，某瓦罐煨汤店遂诉至法院，要求戴某消除影响、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并赔偿相关损失。

【裁判结果】

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中某瓦罐煨汤店作为一家合法经营餐饮的商家，在向戴某出售的食品不存在质量问题的前提下，有权不予退换已售食品，对整个事件无过错。戴某出于一时激愤，在某平台上针对瓦罐煨汤店的经营理念和服务态度发布损害其名誉的文字内容，并引起不特定群众围观，构成对该店名誉权的损害。故判决戴某在某平台上发布一则不少于三十字的道歉内容视频，且留存时间不少于三日，作为对瓦罐煨汤店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的方式，同时判令戴某向某瓦罐煨汤店赔偿损失。

【典型意义】

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既要平等保护经营主体的财产权利，更要重视保护其人格权益。民营经济促进法第五十九条特别强调，民营经济组织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和民营经济组织经营者的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个人信息等人格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互联网等传播渠道，以侮辱、诽谤等方式恶意侵害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的人格权益。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利用某平台对某瓦罐煨汤店实施侮辱、诽谤行为的戴某承担侵权责任，亮明了依法保护经营主体人格权益，支持经营主体安心经营、专心创业的司法态度。

民法典颁布五周年典型案例——“传承中华美德，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专题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时间：2025年5月25日；

信息网络原址：<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65951.html>

案例一：依法判令受益人承担补偿责任，鼓励见义勇为——柴某诉顾某健康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3年12月，柴某与顾某共同乘坐轨道交通七号线镇坪路站上行自动扶梯，顾某位于柴某前方。电梯上行过程中，顾某站立不稳向后摔倒时，因柴某及时救助而未倒，但柴某为救助顾某而受伤。柴某于受伤当天自行前往医院就医，诊断为左跟骨前外缘撕脱骨折，左足、左踝退行性改变。因救助顾某的行为，上海市普陀区委员会宣传部于2023年12月向柴某颁发“普陀好人-见义勇为”证书。后柴某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顾某赔偿其因救助顾某受伤产生的医药费等损失7992.68元。

【裁判结果】

生效裁判认为，原告柴某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为保护被告顾某民事权益而受伤，构成见义勇为，其精神值得褒扬。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因没有侵权人，故作为受益人的被告顾某应当给予原告适当补偿。对于补偿的数额，因补偿责任并非赔偿责任，需综合考虑原告受伤情况、救助行为及所起到的作用等实际情况，同时考虑相关单位已决定给予见义勇为适当奖励，故酌定补偿7000元。宣判后，原、被告均未提出上诉。

【典型意义】

见义勇为、互帮互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生活中，有时会出现因见义勇为使自己受到损害，但相应损失却因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等原因而难以得到赔偿的情况。本案中，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认定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并可根据见义勇为人所受损失和救助行为所起到的作用等实际情况确定受益人承担的补偿数额。同时，为更好激励见义勇为行为，法院还积极协调相关单位对见义勇为人员予以适当奖励。本案裁判为类案提供了规则指引，同时也旗帜鲜明彰显出鼓励好人好事的司法立场。

案例二：经纪公司要求网络主播违背公序良俗直播，主播拒绝履行，不承担违约责任——某传媒公司诉段某经纪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3年2月，某传媒公司与段某签订了《主播艺人经纪合同》，约定段某签约成为该公司旗下主播艺人，通过公司指定的平台进行各种内容的视频、音频直播活动；段某有权拒绝色情、暴力、违规、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及其他有损其人格、名誉或不健康的表演和工作，并不得擅自解约，否则构成违约，违约金为双方约定的年收入的3倍。段某签约后，根据该公司的安排，在某视频平台上进行直播或发布影音视频。在直播过程中，某传媒公司负责人对段某的主播活动进行指导，要求段某隐瞒已婚事实，用各种话术与观众保持暧昧联系。段某明确拒绝该公司的指导意见并要求解除合同。因双方未能协商一致，段某停播。某传媒公司以段某违约为由提起诉讼，请求解除合同，段某支付违约金10万元及律师费。

【裁判结果】

生效裁判认为，某传媒公司要求解除与被告段某签订的《主播艺人经纪合同》，段某也同意解除，故依法予以支持。

根据双方签订的《主播艺人经纪合同》，艺人有权拒绝色情、暴力、违规、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及其他有损人格、名誉或不健康的表演和工作，并有权要求赔偿。某传媒公司要求段某用各种话术与观众保持暧昧关系，违背公序良俗，同时也违反了双方约定，属于违约在先。段某明确拒绝某传媒公司的指导意见并要求解除合同，在多次协商无果后停播，并不构成违约。因此，对某传媒公司要求段某支付违约金及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典型意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随着直播行业的兴起，部分网络经纪公司要求网络主播通过低俗表演吸引流量、诱导打赏等问题时有发生，不仅损害了网络主播的合法权益，而且违背公序良俗，阻碍网络直播行业的良性发展。本案中，某传媒公司要求主播用各种话术与观众保持暧昧联系的行为有损主播人格尊严，有害网络文明，有悖公序良俗。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了该公司关于认定拒绝擦边直播的主播构成违约的诉讼请求，在依法保护网络直播从业人员合法权益的同时，鲜明表达了依法规范网络直播行业秩序，助力营造积极向上、健康有序、和谐清朗的网络空间的司法立场，有力弘扬了民法典关于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的立法精神和价值导向。

案例三：主播虚构事实诱导消费构成欺诈，平台积极处置不承担——谢某诉某科技有限公司、焦某等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1年7月，网络主播焦某多次在某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网络平台直播间虚构其带人解救受困母女的故事：小女孩“玲玲”和亲生母亲被继母软禁，焦某多次直播带人前去解救“玲玲”母女。“玲玲”因每天吃继母喂食的不明药片，浑身无力，病情不断恶化，急需手术治疗。焦某等人在山上找到了“玲玲”的生母，但“玲玲”生母因长期被隔绝在山上，无法交流，遂画了三幅画交与焦某。焦某带着“玲玲”生母找到画中的房子，“玲玲”的继母“大美”住在该房子里，屋内堆放大量玉石。

焦某要求玲玲继母“大美”出钱给玲玲看病，“大美”以钱财均押在玉石上为由表示无能为力。经焦某与“大美”周旋，双方同意由“大美”委托焦某代为卖玉，所得货款用以支付“玲玲”医疗费用。直播间有人称愿意无偿捐款给“玲玲”治病，焦某不同意接受捐款，向粉丝宣称“大美”家有玉器，愿以低价将玉器出售回馈粉丝的爱心来筹集“玲玲”的医疗费用。谢某在浏览视频过程中，留意到焦某直播“玲玲”母女求助、解救、治病、筹款等内容，出于同情，为了筹集善款，于2021年7月8日至7月30日期间在直播间购买了玉手链、玉戒指、玉吊坠等33件商品，支付价款合计10328.1元。后谢某发现焦某与故事涉及人员共同就餐庆祝，遂向某科技有限公司投诉举报，并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某科技有限公司与焦某共同返还购物款10328.1元，共同赔偿购物款三倍金额。

【裁判结果】

生效裁判认为，被告焦某在直播过程中，虚构“玲玲”、“大美”等人物及故事情节，以此获取消费者的同情和爱心，从而达到通过网络销售其产品的目的，构成欺诈，有违诚信原则，有悖公序良俗，应依法退还购物价款10328.1元并赔偿谢某三倍价款30984.3元。被告某科技有限公司在收到原告谢某等消费者的投诉后，即时关闭了焦某注册账号的商家功能，且按照要求提供了涉案违规直播间销售者的真实名称、地址、有效联系方式配合查清案情，故判决对原告主张被告某科技有限公司与焦某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典型意义】

诚信是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网络直播带货作为近年来非常受欢迎的一种新型销售模式，以直观的产品功能展示、优惠的市场价格、主播口碑支撑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销售效率，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随着该模式的普及，某些主播欺骗消费者、恶意炒作营销等现象也不时出现，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破坏了交易秩序。本案中，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认定主播虚构事实“卖惨”带货的行为构成欺诈，并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判决惩罚性赔偿，依法维护了消费者合法权益，对于整治网络直播中编造虚假悲情故事、博取流量和同情卖货等乱象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四：子女长期不尽赡养义务，依法构成遗弃，丧失继承权——高某乙诉高小某法定继承纠纷案

【基本案情】

高小某系高某甲独子。1992年，高小某（时年20周岁）在与父母的一次争执之后离家出走，从此对父母不闻不问。母亲患病时其未照顾，去世时未奔丧。父亲高某甲身患重病甚至做重大手术期间，高小某也未履行任何照护义务。高某甲有四个兄弟姐妹，分别为高某乙、高某丙、高某丁和高某戊。其中，高某乙对高某甲夫妻照顾较多。高某甲去世后，高某乙联系高小某处理高某甲的骨灰落葬事宜，高小某不予理睬，却以唯一的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身份，领取了高某甲名下部分银行存款。高某乙起诉至法院，认为高小某遗弃高某甲，应丧失继承权，高某甲的遗产应由第二顺位继承人继承。高某丙、高某丁和高某戊均认可高小某应丧失继承权，并出具声明书表示放弃继承高某甲的遗产。

【裁判结果】

生效裁判认为，子女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赡养义务。继承人遗弃被继承人的，依法应丧失继承权。高小某自1992年离家后，三十余年来对父母不闻不问，不仅未给予任何经济帮助，也没有任何赡养行为，父母去世后，亦怠于为父母送终，已经构成遗弃，故判决高小某丧失继承权，高小某在高某甲去世后自高某甲账户内所取款项应由高某乙继承，高小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

【典型意义】

百善孝为先，赡养父母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子女的法定义务。该义务不因父母有经济收入、身体状况良好而免除。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继承人遗弃被继承人，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丧失继承权。本案中，高小某作为家中独子，三十余年对父母未尽任何赡养义务，故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遗弃，并判决其丧失继承权。本案裁判有利于引导民事主体更加重视和维系相亲相爱的家庭关系，弘扬孝亲敬老的优良传统和向上向善的家庭美德。

案例五：“挂床住院”不诚信，产生费用应自担——喻某诉李某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1年5月某日，李某驾驶小型越野车与停放在路边的轻便二轮摩托车及坐在车上的喻某发生碰撞，造成喻某受伤、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认定李某负全部责任。喻某受伤后先后四次住院治疗，共住院801天。事故发生前，李某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1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喻某因与李某、某保险公司就赔偿事宜未达成一致，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李某、某保险公司赔偿各项损失60余万元。

【裁判结果】

生效裁判认为，案涉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喻某不承担责任，李某承担全部责任，认定内容及结果客观、公正，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某保险公司、李某应当对喻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在具体损害赔偿计算上，双方就喻某实际治疗天数产生争议，喻某虽主张住院801天，但根据住院病历长期医嘱及体温单显示，其中434天无任何治疗和用药记录，也无体温记录，属于“挂床住院”，故对相应部分损失赔偿主张不予支持，最终判决某保险公司、李某赔偿喻某40余万元。

【典型意义】

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住院时间是认定被侵权人损失的重要依据。近年来，被侵权人为获得更多的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营养费等赔偿而“挂床住院”的现象不在少数。此类行为不仅有违民法典第七条规定的诚信原则，也造成公共卫生资源的浪费。本案中，喻某有434天无任何治疗行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其主张的相关损失不予支持，旗帜鲜明向该不诚信行为说不，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倡导诚实守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徐芬：业主知情权部分法律问题解析 | 衡石·观点

来源：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 发布时间：2025年5月12日；

信息网络原址：<https://mp.weixin.qq.com/s/5BZamw1gd-gptdsCsa3fxg>

业主作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享有了解本小区建筑区划内涉及业主共有权及共同管理权等相关事项的权利。业主行使知情权是其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方式，是业主维护自身权益、实现监督管理、促进社区和谐的基础和保障。随着民主意识、法治意识以及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业主利益需求逐渐多样化，不可避免会与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乃至其他业主之间利益产生冲突。近年来，业主知情权纠纷案件数量上升便是这一冲突的体现。而此类案件中，如何厘清知情权的内涵及外延、规范行使期限对争议的解决十分必要。

Part01 案例选编

案例一：当事人行使业主知情权之目的考量

毛某是案涉小区业主，A公司是该小区物业管理公司。毛某起诉A公司要求查阅复制该公司提供物业服务期间：①小区各项设施检测、巡查、维护、保养记录以及相关外包、采购合同；②对树木、草坪、花坛花景的修剪、养护、布置记录及相关外包、采购合同；③在小区安排、管理或指挥的项目经理、客服、保安、保洁、绿化、维修工、电工及其他物业服务相关人员名单、电子巡更记录、社保缴纳记录及相关人员雇佣外包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

毛某第1、2项请求查阅、复制的内容均属于法定应公开之范围，于法有据，予以支持。

关于第3项请求，涉及到物业人员及外包人员名单、社保缴纳记录，依照法律规定，A公司应将主要负责人员向业主公开，对此予以支持；其他人员名单及所有人员雇佣合同、社保缴纳记录，属于A公司内部管理范畴，毛某主张查阅，并无依据，不予支持。

至于电子巡更记录已包含在第1项主张范畴中，不再重复单列。

A公司不服原判，故上诉。

二审法院经查，毛某与A公司在本案之前因拒缴物业费而与A公司有过诉讼，且在该案中也查阅过部分本案所涉材料。

二审法院认为，毛某提起本案诉讼所要查阅复制的材料大部分已在其与A公司物业服务纠纷中获悉，其又提诉有为自己对抗A公司纠纷之嫌且未见其为公共利益的目的，加之相关材料亦非业主知情权范围，故改判驳回了毛某的诉请。

案例二：业主要求查阅复制资料的客观性考量

杨某等三人系B小区业主，曾多次要求B小区业委会公示相关资料。B小区业委会在履职期间定期在业委会公告栏和微信公众号公示了依法应当公示的资料。但杨某等三人以不知道业委会已公示过、业委会公示方式太小看不清、不会使用微信公众号等为由，坚持要求业委会按照其诉讼请求在小区各支弄分别进行公示。该三人起诉要求B小区业委会公布：① 2018年至2021年各项物业费收支账务及停车位收费账务；② 2022年物业服务收费年度决算，物业费资金收支情况；③ 本届业委会工作档案；④ 本届业主大会、业委会的工作经费明细账；⑤ 历年的小区车位占用费、公益性收入和支出账目明细；⑥ 本届业委会历年来各成员工资（通信费）、值班费、办公费等支出账目明细。

一审法院认为，杨某等三人主张的第1、2项请求不属于业委会掌握的资料，业委会没有公示义务；第3项诉讼请求不明确，无法确认是否属于应当向业主公开的范围；第4-6项诉讼请求，业委会已将相关资料定期在公告栏和小区微信公众号公示，杨某等三人以各种理由要求业委会在各支弄再次公示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杨某等三人不服原判，上诉要求支持其一审诉请。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物业服务企业的选聘与解聘、维修资金的筹集与使用、共有部分用途的改变、利用共有部分从事经营活动等有关共有及共同管理的重大事项，依法由业主共同决定，业委会作为业主大会的执行机关，应持有并合理保管相应资料，亦系业主知情权的义务主体。

故杨某等三人提出的第1、2项诉请应予支持。杨某等三人的第3项诉请，所谓公开业委会的工作档案，经二审再三询问，其对于业委会工作档案的具体内容项目及时间段始终无法予以明确，就其该项诉请实难支持。杨某等三人要求公开的第4-6项诉请所涉材料内容，经审查，业委会确已通过物业微信公众号、在小区公告栏公示等方式向小区业主予以公布，故对相关诉请不予支持。

案例三：行使业主知情权与保护个人隐私的界限

张某诉请其小区业委会提供其查阅、复制的材料中包括业主向业委会或物业提交的用于登记车辆审核的文件材料、登记日期、审核校对人信息；月租车、照顾车车牌对应的业主姓名、门牌号；业主申请新增月租车的排队等候审核登记情况。

一审法院认为，张某该主张包括小区业主的诸多个人信息，存在业主个人信息及隐私的泄露风险，故只供查阅，不能复制。

二审法院认为，业主行使知情权应以相关材料客观存在且不涉及业主个人隐私为前提。张某要求查阅的登记车辆审核材料包括业主姓名、住址、身份证、房产证、行驶证、亲属证明等，因涉及业主隐私，张某要求直接查阅不应予以支持，二审遂改判。

案例四：业主行使知情权有无行使时间之限制

某中心作为小区业主，提起业主知情权的诉请中有一项是要求小区业委会提供业委会历次的决定和会议记录。

一审法院认为，该诉请合法有据，予以支持。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已查明事实，某中心要求查阅的材料系上届业委会工作期间的决定和会议记录，而根据辖区居委会的答复，无论是上届业委会向居委会移交材料还是居委会向本届业委会移交材料时均未制作清单。因此，在本届业委会坚持主张其并不持有系争决议和会议记录的情况下，亦无进一步证据证明本届业委会确实掌握系争材料，一审判决支持某中心查阅该等材料客观上将导致执行困难，浪费司法资源，亦不利于本届业委会开展工作。故改判驳回某中心的该项诉请。

Part 02 衡石观点

业主行使知情权，应以对小区公共事务管理和监督为目的。

业主知情权的行使应具有利益公共性。从社区正常管理秩序的角度来讲，业主知情权行使的主要目的是对社区自治的监督和管理，故业主行使知情权获取信息的目的与保护业主的合法权益相关，有利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和监督。如果业主申请公布查阅的情况和资料的目的不是为了参与小区公共事务管理，或对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监督，不具有公共属性，而单纯是出于私人目的，则应当予以慎重考虑。

审判实践中，不乏出现因业主与业委会关系僵化、与物业公司存在矛盾冲突等导致的滥诉现象，严重影响社区自治效率和正常管理秩序，违背了社区自治制度的初衷，实际上并非实质的行使业主知情权。故业主主张知情权是否基于对公共利益和公共事务的合理监管目的是司法审查原则之一，业主应当明确其行使业主知情权的正当理由，而义务主体如果认为业主具有不正当目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案例一中，毛某承认因其家庭拒付物业费而与A公司产生过相应诉讼，其在败诉之后即提起本案诉讼。二审考虑到毛某在物业费案件中已获悉物业服务合同等材料，其在本案中要求A公司提供的材料又都是针对A公司在提供服务期间是否尽职尽责完成该公司与业委会之间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的内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等材料并非业主个人行使知情权的范畴，毛某的诉请又缺乏为小区公共利益之目的，故法院驳回了其诉请。

业主要求公布、查阅的情况和资料必须是已经客观存在的。

业主在查阅过程中，相关义务主体负有协助义务，业主知情权的范围应当是查阅已经实际存在的材料，业委会及物业公司如确实没有相关资料，则应以情况说明方式进行公示告知业主。亦即业主知情权的行使应具有客观性。如果相关信息和资料并不存在，或者尚未发生，则不属于业主知情权的保护范畴。且，如果相关义务主体已经公布了相关信息，应当视为所有业主已知情，个别业主不能事后以自己未注意、不知情为由再来行使知情权。当然，对于相关材料是否客观存在的举证责任在于业主；而对于相关材料有无公示的举证责任在于业委会或物业公司。

审判实务中，业主提起知情权纠纷有时是为后续诉讼搜集证据，起诉时并不知道是否存在所主张的信息和资料，于是诉讼请求就非常笼统，甚至会基于自己诉讼的需要编撰资料的名称，希望通过诉讼获取更多的信息和资料，然后从中发现对其有价值的材料。如果业主就不存在的资料起诉义务主体要求行使知情权，自然无法获得支持。

另外，业主行使知情权当以其所在小区为限且以不影响他人权益及尽量减少义务主体的负担为原则，不应多次重复查阅，如有复制材料而产生的费用应由业主自行承担。

案例二中，关于杨某等三人要求查阅业委会工作档案的诉请，经法院再三询问，该三人对于其所谓工作档案的具体内容项目及时间段实际无法明确，也无法证明该等材料的客观存在，对于此类行使业主知情权的诉求，法院不予支持。杨某等三人还以业委会公示方式不利于其阅读为由，坚持业委会按照其要求的方式重新公布，显然于法无据，亦难得到支持。

业主行使知情权不能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

业主要求查阅、复制相关资料应具合法正当性。切实保障业主正当的知情权，可以有效抑制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等主体滥用管理权损害业主的合法权益，但不能以保护业主知情权为名，而损害其他主体的合法权益。通常来说，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内容不属于业主知情权范围。

小区内各业主是独立自主的民事主体，其个人权益受法律保护。当群体性权益和个人权益产生冲突时，小区业主的个人权益不得被轻易牺牲，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比如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等，业主行使知情权不能以侵害其他业主的隐私权为代价。故在实践中，若业主申请公开信息涉及其他业主个人隐私的，一般不予支持，如果基于公共利益监管的需要，可对相关个人信息进行隐匿处理再行公开。

另，业主知情权可能还会和其他权益产生冲突。如物业服务企业的财务报表或会计凭证等，可能涉及企业的商业秘密等，业主要求查阅复制上述资料时，人民法院亦应当进行权益衡量。因物业公司的公示义务以与业主利益相关为限，故在包干制模式下，物业公司自负盈亏，物业公司的经营结果与业主无关，除对业主共有财产的管理、收益等涉及公共利益的，其他如物业费的收支等情况非业主共同管理及共同共有的事项，不属于业主知情权的范畴。

案例三中，张某起诉要求查阅小区登记车辆审核材料，但经审查，该等材料范围实际涉及小区业主姓名、住址、身份证、房产证、行驶证、亲属证明等内容，显然涉及业主隐私。当然，在小区停车难的现状下，对于相关车辆是否符合小区停车管理规定，确实属于小区公共管理的部分，故应在对相关隐私信息进行一定技术处理，同时亦能起到核查作用的情况下，予以公布。该案二审中，经释明，业委会将月租车登记信息（隐去业主个人信息和车牌号码中部分数字）后提供给业主查阅，较好平衡了知情权和隐私权的权益保护。

4、业主知情权的行使期限不宜过长。

虽然从法理上来说，业主行使知情权并没有诉讼时效限制，但基于相关资料的保存期限等原因，业主仍应及时行使知情权。故对于业主能够请求查阅或公开多久之前生成的、多长时间维度的资料，在审查时，一应当考量信息资料在客观上的保存期间，二也须考虑业主是否在合理期间内行使权利。由于法律法规并未明确相关资料的保存期限，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业主委员会以相关资料因太长时间而灭失、客观上不能提供为由导致业主知情权不能实现。此外，业主请求查阅太久以前的资料，甚至是其成为业主之前的相关资料，这种情况下，一般会因与业主当前利益关联已经减弱或者物业服务企业已经变更而难以获得支持。

案例四中，某中心要求查阅的资料就因时间跨度长，又涉及两届业委会交接等问题，本届业委会辩称客观上相应资料已经丢失，而某中心也无证据证据本届业委会实际持有该等资料，此情况下，如法院支持某中心的诉请，显然会导致执行困难，也无法达到保障业主知情权的目的。

Part03 结语

业主知情权不仅仅是个人权利，更是社区共治的基石。知情权帮助业主了解小区重大事项，避免信息不透明导致的权益受损，亦能有助于提升业主对社区的归属感，正确行使业主知情权是保障业主合法权益、促进社区和谐、维护社区管理秩序的重要基础。业主行使知情权的监督压力能促使业委会、物业公司规范管理、提高服务效率，形成良性互动。对法院而言，应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保护业主知情权的正确行使，平衡好业主与业委会、物业公司的权利义务，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和居民生活品质的提升。

审理互联网案件的4种思维

来源：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 发布时间：2025年5月26日；

信息网络原址：<https://mp.weixin.qq.com/s/DQWG-BNyY3NCH8o4r8tr3g>

海量的互联网交易在成就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催生了大量互联网纠纷，网上纠纷网上解决逐渐成为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的交易惯例，审理互联网案件与传统民商事案件相比，需要具备以下4种思维：

01 坚持数字司法、保护交易创新

一、数字思维的运用

网络交易高度依赖信息技术，如网络安全、数据保护、支付系统等。基于网络交易服务平台，各角色均有不同的登录端口。在商家后台端，店铺展示页面的“装修”、商品的上架、展示均由经营者以图文、视频等形式在线上传，该过程可不涉及商品实物，虚拟性、跨地域性等特性加剧了网络交易风险，也增加了审理难度，给互联网审判带来了挑战。

数字司法是将大数据、算法思维运用到互联网审判实践中，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AI学习等现代技术，通过智能化原理将数据收集、储存、运用等环节融为一体，同时利用多媒体、区块链等网络技术对立案、审理、执行、审判监督等各个司法程序实行统一管理、控制和运用的过程。互联网审判与数字司法天然契合，上海数字法院建设为互联网案件提供了全面、深入的数字司法平台，为便捷、高效开展互联网审判提供了便利。

例如，在一起共享充电宝服务纠纷案件中，起初对被告送达未果，承办人通过上海数字法院当事人画像发现被告在外地涉刑事案件，通过搜索刑事判决书联系当地承办人得知被告现羁押于监狱，最终赴监狱开庭完成了审判。

又如，在一起信息网络买卖纠纷案件中，有关应用场景提示原告有多起类似案件，为承办人考量原告是否是职业打假人、是否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再如，平台商家经营主体变更乃至注销时有发生，给审判造成不小的困扰。在一起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中，商家在审理过程中注销，上海数字法院主动推送提示商家主体可能注销的信息，既避免了程序出错也提高了审理效率。

二、互联网案件中的数字问题探讨

（一）电子合同的效力

由于网络用户数量巨大，无法采取传统线下——签约的模式，网络用户网上签约、电子合同在线签署是各平台的运营惯例，电子合同便捷、高效、重复使用和更新及时的优势不言而喻。然而在诉讼中，很多用户提出平台协议约定条款系格式条款、属于无效条款的主张。

电子合同是否有效，关键看提供格式合同的平台一方是否“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如是则可以认定其有效性。包括平台协议是否醒目展示或明确提示，协议版本更新有无定期更新，用户签名确认材料有无保存，对影响用户重大利益的格式条款在商品介绍或活动规则中的展示位置及醒目程度、格式条款是否属于缔约的必经确认步骤、是否得到网络用户的明确确认等。

（二）平台证据如何审查

互联网纠纷案件中，平台提供的证据大部分来源于后台数据，但诉讼对方经常会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数据均由平台所有，可能存在篡改。

审查此类证据，可从如下方面考虑：一是进行公证或可信时间戳认证；二是采取当庭演示的方式展示数据生成的客观性；三是平台初步举证后，应由对方提交相反的证据或进行足以证明平台数据造假的说明；四是必要的时候可以委托专业机构进行数据鉴定。

（三）算法歧视如何证明

首先，由消费者提出系统计算结果缺乏公平性的初步证据，如不同账号相同情况下优惠金额不同的截图、活动规则设置不透明不合理导致无法达成活动目的的操作视频等。

其次，应由平台提供优惠或活动的手册或页面说明、用户协议等，以证明平台已充分尽到告知义务。

再次，消费者可通过对比测试等，证明在相同输入条件下无缺陷的系统设置与有缺陷的系统设置在算法输出上的差异，或是现有系统设置得出明显不合理结果的证明。

最后，在前述情况存在高度盖然性的情况下，平台应提供系统设置的详细记录，说明该设置的逻辑步骤及设置效果，并提供相应的实际数据，通过数据分析，展示由于系统设置是否导致算法输出结果偏见或不公。平台亦可提供专家评估报告，指出系统设置中的具体问题及其对算法运行可能产生的影响，明确系统是否存在算法缺陷。同时，平台还可以针对消费者对平台算法公正性的质疑提出相反的证据，如案外人参与活动并成功领取奖励，推荐浏览页面呈现方式系客观多样性等。

（四）庭审模式如何选择

网上案件网上审是互联网案件的一大特色，但是，是否所有互联网案件均适合在线审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第五条、第七条及第二十一条从诉讼能力、案件难易、身份及原件核验、证据数量等多个方面对在线诉讼的适用进行了限制。在线诉讼固然便捷高效，但不能以牺牲案件质量及当事人合法权益为代价。一般来说，只有案情简单、双方当事人争议不大、适用在线审理不会导致案件事实无法查清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在线审理。

（五）刑民交叉问题难以处理

互联网的普及在惠及大众的同时也被犯罪分子加以利用，各种网络犯罪日益猖獗。有的犯罪分子在互联网平台开设店铺从事网络赌博、黑灰产、洗钱等网络犯罪，有的店铺从事着赌博及洗钱的下游角色，成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共犯。这类案件涉及话费、电费及虚拟卡密充值等，存在交易流水巨大、收货地址或收货人虚假、订单伪造、店铺无法披露商家信息等异常情况。平台后台监测到违法信息后出于交易安全考虑往往对店铺资金采取限制提现措施并进行报案，但该类案件涉及地域广泛、上游犯罪分子及服务器往往在境外等原因导致公安刑事侦查困难、刑事立案滞后，给人民法院民事审理带来了很大难题。

三、对新的互联网业态应持什么态度

数字经济时代，电商直播、“云购物”、在线教育、在线医疗、智慧旅游等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不断涌现，为消费者提供多元化的购物体验，同时也给司法界定提出新的难题。比如直播带货模式下，平台内商家、直播间运营者、网络直播营销平台、主播等责任主体难以确定。又如网络购物平台中为推广平台、提高客户粘性设置的游戏积分、签到领券、免费试用等活动，可能涉及射幸合同、所有权保留的买卖合同等多种不同法律关系，需根据具体条款约定进行个案判断，而法院应对新互联网业态的基本原则应该是“保护交易、鼓励创新”。

如果说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互联网法治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商法的特别法。效率是商事审判的基本要求之一，也是营商环境考核的重要指标，互联网审判作为特别法更应当秉持效率原则，对层出不穷的互联网新业态应当充分考量其行业逻辑及经营目的，在法律框架内最大程度给予肯定，特别应慎重否定合同效力，体现司法对上海数字经济发展的服务和保障。

02肯定自律管理、明确平台责任

实践中，很大一部分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产生的原因系商家或用户被平台处罚，很多商家或用户存在一种误区认为平台并无管理和资金限制等处罚权，该等权利属于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然而实际上，不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协议约定均赋予了平台自律管理和作出相应处罚的权力。

一、互联网平台享有自治权

互联网平台与商品销售者或服务提供者等商家之间形成网络服务合同关系，商家拥有享受平台提供的平台服务并获得销售利润的权利，就应当承担接受平台对其进行必要的规范性自律管理的义务，若商家违反平台的管理规则，应当根据双方的约定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从缔约自由角度看，电商平台并非垄断行业，无论商家还是消费者均有选择交易平台的自由，有完全的意思自治。商家一旦入驻电商平台并签署协议、接受规则，即视为对自身相关权利的让渡，就需要服从电商平台自律管理。

需要强调的是，平台规则并非一对一的传统合同，不是电商平台与某一具体商家决定或修改的，而是电商平台与所有商家共同达成的一致契约。遵守平台规则不单是商家对电商平台的义务，也是对其他商家的义务，更是对消费者的义务。从权责一致的角度看，在电商平台上经营的商家不仅享有网络交易便利迅捷、辐射广泛的利益，也须承担在不与消费者见面条件下的诚信经营义务，并对自己的失信违规行为承担责任。商家不能一边破坏自律管理组织的交易秩序和规则，一边继续享受平台服务带来的便利。

司法应当尊重平台对商家采取的管控措施和对消费者的保护体系，引导商家严守法律和平台规则、合法合规经营，维护正常的平台管理秩序，在法律框架内支持电商平台通过争议在线解决机制对平台内纠纷进行管理。与此同时，争议在线解决机制作为网络治理乃至社会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有助于发挥电商平台在网络交易中的解纷作用，将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推动纠纷防范化解向源头前移，进而从源头上减少互联网纠纷案件。

二、互联网平台需依法承担责任

权利义务对等是基本的法律原则，如前所述，互联网平台在享有自律管理权的同时也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该责任主要表现为当商家在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过程中造成消费者损害时，商家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互联网平台则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承担附条件不真正连带责任。即：商家系网络侵权或违约行为的直接责任主体，只有当互联网平台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及“事先承诺先行赔付，或者不能提供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等情形时才承担附条件的不真正连带责任。

基于互联网平台承担法律责任的特点，互联网平台在消费者与网络商家的纠纷中并非直接的责任主体，其在享有对网络商家自律管理权的同时不能超出公序良俗的范畴。

互联网平台承担责任方式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以下简称《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针对不同情形对电商平台设置了各种义务，主要包括：

（一）平台的审核义务

包括审核入驻商家身份证、活体认证、营业执照、经营许可、银行卡、经营类目等基本信息，及时对侵权商品进行下架或断开链接处理，并在消费者起诉后依法披露入驻人身份信息。若无证据证明平台存在明知或者应知销售者利用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且未采取必要措施的情况，应视为电商平台已完成了相应审核义务，依法不承担责任。

（二）平台的安保义务

《电子商务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规定了平台对商家的信息核验及定期更新义务，发现商品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要求时，应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确立了电商平台的安全保障义务，旨在要求电商平台更加积极地作为，采取防范或制止危险或防止损害后果进一步扩大的必要措施，保障交易双方基本的人身及财产安全。除侵权人直接侵权责任以外，若电商平台未尽如下义务，应视为电商平台未尽危险预防及消除义务，应当在安全保障义务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具体包括未按照《电子商务法》的规定对特殊商品采取高于普通商品的入驻人及商品信息审查义务，在电商平台日常维护管理中未尽定期核验更新义务，针对可能对人体有害的特殊商品未进行警示告知等。

（三）平台的信息保存义务

《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电商平台就商品和服务信息、交易信息负有记录和保存义务。网络交易特别是直播带货中的在线咨询、投诉、售后反馈记录、电话录音、视听资料、推荐软文等电子信息均属于上述范围。电商平台若属于保存或保存期限未达法律规定的三年的情形，可能因此承担责任。

综上，法律规定电商平台在未尽入驻审查、安保义务及信息保存等义务时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设置多种责任的目的是为了配合网络消费者维权而倒逼电商平台承担与其能力相适应的义务。

03 合理制定规则，保持处罚谦抑

上文已分析平台具有自治管理权，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平台规则。实践中，大部分涉平台管理类纠纷案件的情况是，平台对商家或用户的处罚并非没有根据的随意处罚，但纠纷数量依旧居高不下。究其原因主要是平台规则的制定不够合理，处罚幅度与过错程度不匹配，小错大罚、各错同罚等情形较为普遍。任何一项制度的落地都需要人力来执行，若因为人力限制导致本意良好的平台制度执行走样，最终会损害规则的公平性及平台的商誉。

法官在办理涉平台处罚纠纷案件时，需秉持公平、谦抑原则，通过审查平台制度想要达到的真实目的，结合商家或用户的过错程度、违约情形及给平台造成损失的大小等，根据不同情形作出与具体案件相适应的处理结果，小错小罚、大错大罚、无证据不罚，最大程度发挥平台制度的作用，避免好的制度因为平台的不当处罚而难以推行，同时能够衡平保护商家、消费者及平台各方利益。

一、互联网平台自律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概念定义模糊

网络交易中行业用语较多，如刷单和套券、虚假发货和延迟发货等，以普通人的认知较难准确理解其中含义，而这些往往是互联网平台自律管理的重点。当平台针对出现类似问题的商家进行处罚时，双方往往因协议对上述问题的概念定义模糊而理解各异，从而引发争议。

（二）认定过程随意

商家售假被处罚的案件中，商家多以平台商品抽（送）检过程不规范为由否认商品的同一性。部分案件平台未能对送检商品与商家所售商品的同一性尽到基本注意义务，未能遵照抽检程序规范性要求全程留痕留证。此外，多起案件暴露出平台相关人员在抽检商品时操作不规范、取证意识不强的问题，对抽检过程中随机下单、寄送平台、平台收货、送检等环节未能做到全程录像或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导致商品同一性存疑。

（三）处罚标准不一

互联网平台对违规网络商家的处理方式多为警告、下架、流量限制、封禁账号、冻结账户、扣除保证金等，其中争议最大的处罚手段为冻结账户货款、扣除保证金。部分案件中，平台对商家首发、偶发的少量违规情形未采取警告、下架等轻微处罚，而是处以冻结账户货款、扣除保证金等较严厉的处罚措施，或者对违规情形相似的商家部分解除限制，部分继续限制，从而引发争议。

（四）平台审核仍需进一步完善

审理中发现平台一定程度上存在对店铺资质及商品质量审核松紧不一，对消费者投诉的处理快慢不一的现象。随着技术的发展，平台建设初期所设计的对入驻商家资质审查的方式，现已难以辨认假冒、伪造证照，亦鲜有对商家销售产品是否超出其入驻时勾选的范围进行主动、定期审查。实践中，存在商家或其法定代表人（经营者）的身份证、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等被他人嫁接、冒用开设网店，商家入驻后随意跨类经营以规避资质审核，商家上传的证照所载签章或重要要素模糊不清、难以辨认等情形。

（五）处罚规则提示不够明确

在一些案件中，平台未对活动适用的处罚规则进行特别提醒，或将处罚规则进行折叠不便于查阅，且未提前告知商家一个违规行为可能触发多个规则下的合并处罚。此外，处罚及处置时间个案操作不一，时间跨度较大，未能给入驻商家提供合理预期，不利于发挥违规处置的预防警示作用。

二、制定平台规则及处罚措施的基本原则

（一）因势利导，维护平台管理积极性

从实践做法及源头化解互联网纠纷的方向上看，由平台进行自律管理是平台经济的主要做法。对此应通过立法明确平台的自律管理范围、方式及手段，以维护平台管理的积极性和合法性。从《电子商务法》中不难看出，国家对平台自律管理持肯定态度，平台权责更为明晰，关于平台管理手段的部分条款如“争议在线解决机制”“消费者权益保证金”等对接主流平台的现有管理规定，在鼓励平台积极投入管理、主动维护网络交易安全、保护网络消费者权益及互联网纠纷前端在线化解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合理规制，把握管理与盈利的边界

平台在自律管理的过程中对商家违规行为的处置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大多数平台会在自律管理规则中设置保证金、违约金、消费者赔付金等条款，这些涉及金钱的“惩戒”措施必须科学合理地设定一个“度”，即由平台正确把握“惩戒”与盈利的边界。虽然法律法规未对此加以规范，但平台对金额的设定不能违背公序良俗及比例原则，不能使“惩戒”成为平台的盈利手段。

（三）公开公示，确保管理过程可视化

平台在自律管理过程中负有信息披露义务，在其自行制定管理规则并行使管理和“惩戒”权的同时，也应由市场监管部门、消费者和商家进行监督，做到平台管理过程可视化，特别是规则提前公示及处罚警示通知。这样一方面是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平台自律管理的公信力、优化网络营商环境；另一方面也符合禁止权利滥用的原则。

04 鼓励合法维权、反对非法牟利

一、明确商家系第一责任主体

实践中不少消费者对法律关系缺乏认知，将平台直接作为网购纠纷的交易对手提起赔偿诉讼。然而，在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平台内经营者即各类商家系商品或服务的实际提供方，消费者与商家构成信息网络买卖合同关系，消费者与平台构成网络服务合同关系，平台仅为交易达成提供商品展示、协调沟通及代为预定等服务。商家系交付完好商品或提供合格服务的第一责任人，一般来说，网络平台只有在前文分析的“明知应知”、审查不当、未尽信息披露义务等法定情况下才有可能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平台应协助消费者维权

与传统买卖不同，信息网络买卖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网络消费受众范围广泛、跨地域性强，一旦出现商品质量问题，与传统线下消费的局限性相比其影响范围显著扩大；二是互联网销售模式进货来源多、库存不固定等特点加大了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管难度；三是网店商家与消费者空间上的客观距离及电子证据难以收集及固定等原因加大了消费者面临商品质量问题时的维权成本。

基于上述差异，一旦与商家发生争议，网络消费者往往难以维权，需要平台介入并参与纠纷调处。此外，电商平台从其业务中获取了广告、增值服务等收益，因此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平台具有协助消费者维权的优势，其掌握交易各方历次交易的信息，以及平台内经营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被投诉及评价等记录，特别是拥有提现审批权，可以综合评定交易各方的履约能力，保障交易安全完成。

三、鼓励合法维权、反对非法牟利

鉴于网络消费的特点及消费者与商家乃至平台的强弱地位之别,《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诸多网络消费司法解释均体现了对消费者的倾斜保护。然而,上述法律法规实施多年来各地实践中出现了新情况,职业打假人作为原告的网购案件占比大幅攀升。在此背景下,人民法院需要妥善处理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的合理维权与牟利索赔的边界,衡平保护买卖双方的合法利益。对于售假行为一方面要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维护正当、合理的消费诉求;另一方面要坚持“过罚相当”原则,规制高额索赔行为,服务和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例如,消费者李某诉商家代某、A平台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原告在直播间观看时,商家主播代某宣传其出售的商品为“高货,全冰种,达到两百万级别”的翡翠,并承诺“假一赔三”。原告下单购买三件商品,单价1199元共付款3597元,收货后将其中一件涉案商品送至鉴定机构,鉴定结果为“石英岩玉(处理)手镯”,原告遂以“与被告达成1199元购买200万元翡翠的合同”为由起诉要求被告以宣传的200万元为基数三倍赔偿1800万元及其他损失等。因被告代某自愿承担原告实际购物款10倍的赔偿,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代某向李某赔偿36000元等。

本案惩罚性赔偿应如何认定?首先,被告在直播间的虚假夸大宣传构成欺诈,应当向原告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其次,若原告认为应以200万元作为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应当相应地支付200万元的对价,但原告实际仅支付1199元;再次,若将该200万元理解为被告承诺的违约金,则按照《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的规定,被告可以根据原告的实际损失要求调低违约金;最后,被告所述的“两百万级别”并非认可与原告达成“1199元购买200万元翡翠的合同”,该等利益失衡、显示公平的约定显然无法得到法律支持。综上,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承担需以“过罚相当”为原则,以买方实际支付的商品对价为基础,结合损失情况、过错程度等衡平综合考虑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

一方面让虚假夸大宣传的卖方受到与其欺诈程度相适应的惩罚，另一方面在填平买方损失及适当惩罚性赔偿的基础上避免买方不当牟利。

结语

互联网纠纷案件具有法律关系复杂、交易模式新颖以及纠纷涉平台等特征，各类层出不穷的团购、百亿补贴、秒杀、拉新助力、AI智能评价、便捷售后、平台治理及商家管理规则等数字经济新模式对人民法院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办理互联网案件既要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遵循鼓励商事交易、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原则；又要充分、正确评价平台在互联网交易及纠纷中扮演的角色，不能混淆平台经营者与平台内经营者的地位，同时应全面审查平台是否承担法定责任的情形；还要督促平台合理制定规则，引导当事人理性维权。